

国歌



前出发

寻访沈阳地区义勇军故地

题记 1931年10月周恩来在《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满洲与我们党当前任务》一文中指出,现在“救国义勇军的组织已成为工农劳苦群众的普遍要求,我们要领导工农及一切被压迫民众自己组织武装的救国义勇军”。



今天的巨流河老桥和附近的碉堡



义勇军在白旗堡袭击日军列

在新民,铁路是角力点

白旗堡的余音

金硬,这位同宋黎一起并肩战斗过的革命前辈于2014年因病在沈阳逝世,享年100岁。他是新民县白旗堡东村人,当年参加了宋黎领导的义勇军队伍。2017年8月,金硬之子金铁将他父亲一段有关义勇军活动的口述资料转给报道组:

我初到北平不久,1932年1月28日就发生日军发动的上海之战(即淞沪抗战),驻沪的十九路军蔡廷锴奋起抗战,全国各地都组织支援上海的抗日战争。那时我就知道戴福纯同学去了上海。上海停战后,我见到了戴福纯。他曾向我说,有人要去东北组织抗日义勇军,需要懂得军事的人去参加,要我再帮助找其他同学一起去。我介绍了那拯彬,后来我们与宋浩然(即宋黎)经过化装一起先到塘沽,再乘船到营口,然后坐火车到沈阳。这时沈阳正值霍乱盛行,防疫很紧,城内旅店没有多少旅客。我们就转赴新民县城。我改名叫金树仁,才19岁,根本没有社会常识。当时新民县火车站驻有少数日军,日本改编当地武装为自卫团,总团部设在县城,各区都有自卫团。宋通过社会关系与自卫团建立了抗日关系……

宋曾向我布置一项任务,说四区自卫团已秘密参加义勇军。那时印了许多抗日义勇军的背章,要我去白旗堡车站,四区自卫团来自白旗堡车站接收这些背章。我把背章包好就乘火车去了白旗堡。下车后,四区自卫团派了武装人员来火车站接收,我交给他们后就回家了。

我与父母见面后,才知道我的大哥金万安去了北满安通县的大舅那里,我的姐姐已住在新民县城,姐夫是站前派出所的所长。我很快就返回县城,看了姐姐和姐夫。恰在这时,我得知白旗堡西村的王二瞎子(外号)不知什么原因被关进了新民县的监狱。他从监狱逃出来拉起一个武装队伍,宋浩然想争取他抗日,就派了孙某去进行工作。为了武装占领新民县城,阻止敌人增援,(他)派我组织铁路破坏队。我通过一商人买了一些破坏铁路的器材。这些事情都是在柳河沟附近农村进行的,参加的人员也大多是农民……宋认为时机成熟,规定了攻打新民的时间一起行动,把掩护破路武装的联络工作与切断电源的任务交给了我。我与孙都去西线,孙去说服王武装进攻新民城。我去找掩护破路的山林队“双阳”。我在寻找“双阳”时遇到两支山林队。他们把我留住,也不看管我,我就只好利用这几支山林队要各奔东西的情况下,潜伏在豆地垄沟中。山林队都走了,我才出来沿铁路返回白旗堡。第二天,我找到“双阳”。他们是只有二三十人的武装。我与他谈了掩护破坏铁路的任务,规定在当天的夜里,把警戒放在白旗堡西边的一个铁桥的西侧。这时,另一个山林队头目知道我要去破路,主动送给我几包TNT炸药,足见抗日是人心所向。

当时铁路破坏队也带着破路的工具到桥头。在武装警戒下,分二组作业:一组用木工工具把输电线杆弄断,电线一接地就一片火光;另一组在桥头,拆木板,撬道钉。完成这些任务后,我就叫他们撤退。我自己留在桥头选了个地点把TNT炸药点燃。一声巨响,我又察看了结果。因药量不足,没有起太大破坏作用。我就返回了家等待新民消息。第二天一早,一部分日军开到了白旗堡车站,向西打了几炮但未敢再西进……

沈阳日报、沈报融媒记者
伏桂明、王远、周贤忠

巨流河的见证

2017年8月26日,报道组沿304国道前行,来到了巨流河大桥。

这里有两座巨流河大桥,一座是新桥,车辆川流不息;另一座是老桥,已被废弃,与不远处的新桥相望。老桥的东侧是铁路线,西侧巨流河两岸的老碉堡、老岗楼虽已残破,但足够令人想到曾经的战火硝烟。这里,便是当年宋黎带领义勇军战斗的地方。九一八事变后的第9天,即1931年9月27日,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于北平成立。周恩来即令中共北平市委积极派出尽可能多的党员和反帝大同盟盟员及在党的影响下的进步青年到救国会开展抗日宣传工作。就是在这样背景下,宋黎被派回东北组织发展抗日义勇军。这段经历,被宋黎写成《怒洒一腔血 保卫我中华——组织东北抗日义勇军经过》一文(刊载于《辽宁文史资料》第9辑)。这篇回忆文章多处提到巨流河大桥:

1932年5月间,我同戴昊、江涛、那拯彬到辽西一带继续开展武装抗日活动。

经过许多艰苦工作,我们逐步把分散在辽西地区的抗日力量组织起来,成立了“东北抗日义勇军总指挥部”,队伍发展到一千人。总指挥是我,参谋长是江涛,军事负责人有戴昊、那拯彬。为了安全,我们的指挥部设立在新民县东长沟沿地方保安队骑兵分队李队长办公的地方。这个分队原是地方开明士绅,同情抗日,有正义感。为了争取他积极抗日,我首先通过一位姓李的回民

老乡做他工作。以后,我通过老李认识了他。第一次同他见面时,是在他的办公室里。那一天,日寇不断打炮,炮弹从房顶嗖嗖而过,他却泰然自若。我向他讲解了一些抗日道理。在我讲话时,他插言问我:“少帅怎么样?”我对他说:“少帅想抗日,可是蒋介石不干。”他沉思一会儿,果断地说:“应该干!我一定抗日。”于是,我们便委托他做营长。此后,他不仅积极抗日而且英勇善战,经常向我们报告日寇的行踪。日寇进攻时,在我们统一指挥下,一同向日寇作战。日寇走了,就由他出头维持地方秩序。不仅如此,他还把附近的地方保安队一个姓吴的小队长介绍给我们,为我们通风报信,在战斗中起了不少作用。有一次,这个吴队长接到伪军通知,让他们配合日寇在长沟沿一带围剿,追击抗日义勇军。他立即告诉我们,我们当即转移,使敌人扑了空。

为教训日本帝国主义,指挥部决定于1932年10月攻打新民。决定以后,我只身进入新民县城内了解敌情。通过可靠关系介绍,我到清真寺了解情况,有时隐藏在阿訇那里,有时住在抗日群众家里。敌人在新民县城四周拉了电网。为避免与减少我军伤亡,我通过一个姓李的教师同新民县电业公司联系,确定到电时不送电。为阻止敌寇增援,准备在打响后,用火车头将通往巨流河的大桥堵死,同时对各路进攻路线都做了周密部署,把力量较强的第四民团调来专门对付日寇装甲车。攻打新民,由我任总指挥,当时我方21岁,缺少战斗经验。

在进攻前,我们考虑到新民离沈阳很近,打响以后,敌人会很快增援,我们决定不进行占领,进攻的主要是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对敌人进行破坏,以壮大抗日力量。目的达到后,我们就分路撤退了……

我们除利用一切机会打击日寇与瓦解伪军外,还布置队伍发动人民群众破坏敌人铁路交通。当时,日寇在铁路沿线曾派驻大量军队,几乎天天在打炮。住在巨流河铁路旁的铁路工人孙队长为了打击敌人,组织了二十几个铁路工人专门破坏铁路。我就以铁路工人为主体,组成了一支铁路爆破队,由我们抗日义勇军总指挥部直接指挥。在破坏敌人交通方面,大家想出很多办法。工人和老乡一起,把大车轮子卸下来,用钢瓦接头的豁口撬铁轨铆钉,效果很好。戴昊、那拯彬、金硬同志还发动我们义勇军干部和战士们想办法,动员群众在夜深人静时把敌人未炸响的炮弹悄悄运到路轨上面,把一颗或几颗炮弹放在一起,用火药,使炮弹爆炸,破坏铁路桥梁,经常使敌军用火车停运。

在当时,巨流河地区确为兵家必争之地。除了宋黎所部,还有多路义勇军在此与日伪作战,如以张国襄(张常在)为司令的第四十路军。1932年3月,张国襄在新民县公安大队的基础上组织抗日军,约500人左右。张曾率部攻打新民,在巨流河与日伪军作战。再如耿继周部:围攻新民,耿派君子仁率小分队炸掉巨流河大桥。

